

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代耕队的动员与互助

冯 兵 葛瑜婕

摘 要: 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代耕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民间变工传统、响应战时需求、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举措。边区政府通过颁布条例、建立组织、细化代耕办法,将代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实现了对社会力量的有效动员。其实践过程体现了边区政府、代耕户和抗属等不同主体之间互助关系的演进和深化。代耕队工作的开展,保障了抗属生活,提振了前线士气,从而巩固了统一战线,引发了参军热潮,增强了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代耕队在广泛的社会动员中发展壮大,在深入的互助实践中走向成熟,并最终对革命事业给予了有力反哺。

关键词: 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代耕队;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2-0164-07

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创立的代耕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实践。代耕队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导下,以行政乡或村为单位,以义务形式组织本地群众,专门为缺乏劳动力的抗日军人家属提供耕种、收割等生产援助的制度化、政治化的群众互助组织。在此语境下,“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嵌入、政策引导和思想宣传,整合分散的个体农业生产活动,使其服务于抗战全局的举措。代耕队在促进农业生产、保障抗属生活、稳定军心民心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考察边区优抗政策和群众动员的重要视角。

学界对此议题已有关注,现有研究多从优抚政策切入,阐释代耕队在落实抗日军人优待政策中的地位与实践路径,形成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①,但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首先,对代耕队具体实践逻辑、在基层工作中的动态调适以及与抗属、边区政府等不同主体的互动关系缺乏深入剖析。其次,对代耕队所蕴含的政治动员逻辑及其与党的群众路线、统

一战线的关联探讨不足,缺少横向比较。鉴于此,本文着力对代耕队的动员背景、具体措施以及实践过程中的互助张力与主要成效进行梳理分析,力图在呈现代耕队实践动态的基础上,丰富陕甘宁边区史、中国共产党抗战史与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史的研究内涵,为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社会动员模式、乡村治理路径与群众工作方法的理

一、代耕队的成立动因

代耕队的成立根植于陕北农村“变工”“扎工”的民间互助传统,迫于劳动力不足、经济封锁带来的生存压力,基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考量,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极端困境下实现经济自救与政治动员的体现。

(一) 源于变工互助的民间传统

陕北农村长期存在的“变工”“扎工”等习俗,为

收稿日期:2025-12-02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扬斗争精神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SC22ZDYC31)。

作者简介:冯兵,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207)。葛瑜婕,女,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太原科技大学讲师(四川成都 610207)。

代耕队的产生提供了文化土壤与形式借鉴。“边区在旧社会,群众就在农忙季节组织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等形式,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1]²¹⁵其核心是农户间基于地缘、亲缘进行劳动力或生产工具互换,主要是为应对农忙时节的劳动力不足。边区农谚“犁怕二犁,锄怕五张”^[2],正是对集体协作提升劳动效率的经验总结。变工形式多样,有经常的,有临时的,有亲戚、友邻间讲情面的,也有讲好条件要补工或折合工钱的^[3]。协作方式上有劳动力变工、农具或畜力变工、搭工组等,本质上是一种自发、互惠的经济协作,依赖于熟人社会的信任,因而具有临时性、松散性和范围有限的特点。“可是它适合于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如果能因势利导,有计划地组织领导,便可以使它成为发挥劳动力、提高生产的组织。”^[4]中国共产党敏锐发掘这一习俗的动员潜力,改造并保留其互助内核,推动其实现组织化、制度化。关中别岭村、白源村等地的变工队中,部分即为优抗代耕队^[5]。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于同年8月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改良抗日军人的待遇^[6]。陕甘宁特区政府于同年12月出台《抗日军人优待条例》,明确抗日军人家属代耕代种政策^[7]。传统变工乃农户自愿结合,对象为一般乡邻,依循人情习惯,来去自由。代耕队则由边区政府主导,以抗属为服务核心,以纪律为约束,并通过政治动员宣传拥军优属意义,将代耕劳动归为革命贡献,转化为群众内在自觉,实现广泛且持续的运行。代耕队源于变工却与之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对民间互助形式组织化、政治化改造的成果,有着优抚拥军和革命动员的新内涵。

(二) 迫于战时环境的生存需要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总后方,承担着指挥和支援全国抗战的使命,大量青壮年响应“抗日救国”号召参军入伍,农村劳动力锐减。而边区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恶劣,耕地多为坡地,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人力投入。劳动力流失直接造成耕地荒芜、粮食减产,1939年延安等十九县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亩,已耕面积仅为900万亩^[8]³⁰⁶。这一状况威胁边区军民的生存,动摇持久抗战的物资根基。弥补劳动力缺口、恢复农业生产成为边区存亡攸关的紧迫课题。外援是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38至1940年外援占比分别为51.6%、85.79%、74.7%。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大部分断绝^[1]⁴。正如毛

泽东所说:“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9]外援断绝与经济封锁形成“经济绞杀”之势,意图从根本上瓦解边区的生存基础。面对这一生死考验,中国共产党迅速调整战略,将政策重心转向内部动员,明确提出“要以广大群众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的来发展各方面的生产运动,开发财源,以解决部队吃饭、穿衣、军需的困难,使抗战坚持到最后的胜利”^②。内困外扰的境遇,将边区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也催生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突围之路。

(三) 基于统战的政治考量

据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实录》记载,当时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的家庭约有2万户^[8]¹²³,其中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大量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一线,直接导致边区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军需供给。同时,参军家庭劳动力流失,许多抗属陷入“有田无人耕”的困境。1939年10月11日,安定县政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呈文中写道:在这屡减收成之天灾情况下,“唯受所限代耕之抗工属,尤啼哭顾虑待日之饥生”^[8]³⁹⁹。这不仅会动摇军心,而且可能削弱民众对统战工作的信任与支持。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优待抗属”的政策关怀转化为切实行动。由此,代耕队应运而生,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互助,解决了抗属生产生活问题,缓解了后勤压力,以实际行动增强了统战政策的凝聚力。

二、代耕队的动员措施

为保障代耕实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建立由乡政府领导、以村为单位的组织体系,将代耕确立为法定义务。同时细化办法,明确分工到人,形成权责清晰的运作机制,有效拓宽动员范围,提升了政策执行的效果。

(一) 颁布优抗代耕相关条例

为落实代耕制度,保障抗日军人家属生产生活,陕甘宁边区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条例,构建起系统的优抗代耕保障体系。1937年9月20日,边区政府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通令——关于秋收问题》明确要求:“在秋收中要动员群众尽先帮助红军家属和切实进行公地的收获与保管。”^[8]⁹《抗日军人优待条例》规定:“抗日军人家属缺乏劳动力耕种之土地,特区人民应尽代耕代收

之义务。”^{[8]41}1937年12月,边区政府制定和颁布《陕甘宁边区优待抚恤抗日将士条例》《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要求对抗日军人及家属实行优待,对缺乏劳动力的抗属家庭由当地政府组织群众代耕。1938年4月17日至23日,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布边区抗战以来职工运动的总结,论及优待抗属问题,以延川清延区来说,一乡、五乡、七乡的全体工人已自愿地保证了抗日将士家属5个月的担水砍柴,3个月的粮食,并决定每个工人负责代耕一垧半土地^{[10]243}。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关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以法规形式确立代耕制度,规定抗属可享受代耕服务,并由基层政权负责实施。条例明确指出:“抗日军人家属,凡有土地而劳力不足,又不能维持普通生活者,均酌量为之半代耕或辅助代耕;凡土地少而又全无劳动力,无法谋生者,则为之全代耕;凡无资产无土地无劳动力,或尽其力尚不足维持生活者,由地方政府拨给公地代耕,并酌情救济之。”^{[1]131}这些条例的颁布,为代耕队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筑牢了军人权益保障的防线。

(二)明确代耕队组织架构

为促进代耕制度施行,陕甘宁边区设立专门协调机构,构建层级化组织,明确人员配置,完善了代耕队的组织架构。1939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关于乡村级党和政府及民众团体组织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要组织优抗互济委员会,协助政府讨论与推广乡村中的优待抗工属工作与互济问题,如组织代耕队、救济难民等^{[8]322}。同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义务耕田队条例》明确规定:“义务耕田队,是群众自愿条件之一种义务劳动组织,帮助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之抗日军人家属,进行代耕代锄代收等工作。抗日军人家属有劳动力者,不在此例。”^{[8]499}耕田队由乡政府统筹组建,按抗属人数与实际劳动量规划,每支耕田队需配备正、副队长各1人,共同主持并领导全队的日常事务。每村分若干班,每班5人至10人为限,每班设班长1人,领导全班事宜,队长及班长从队员中推选而来。全乡有1个总队长,管理全乡的代耕工作。分队里设正、副队长,小队里有小队长。如贺家川行政村为1个分队,孟家沟有1个小队。凡本村18岁至55岁的男性全劳动力,均编入代耕队^{[11]78}。义务耕田队每月召开全体大会,每半月召开班长联席会议,均由正副队长召集,每10天由班长主持班务会议,同步检查过往工作、研讨后续计划。这套层级

分明的组织架构,使动员指令能够直达基层,提升了代耕动员的响应效率和执行效果。

(三)细化代耕办法

为增强动员效果,保障代耕工作落地并长期运行,边区政府持续细化代耕办法。1941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义务代耕队条例》,明确代耕队以乡为单位,在乡政府和抚恤委员会指导下帮助抗属进行代耕代锄代收等工作。同年3月,边区政府民政厅发出《为优待抗属组织代耕工作给各县的指示信》,并在4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代耕队的组织工作,“边区有二万多户抗属,且多是贫苦的农民,有的耕具种子不足,甚至没有耕具。代耕的办法,吃自己饭,带耕具去,种子不足,由群众资助;规定代耕不得马虎,耕得不好要把自己种的地兑换”^[12],从操作层面细化了代耕责任。1942年12月,边区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修正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增加了新的内容,对优待的对象、优待的原则、享受的优待内容、代耕土地等做了详细规定,如“本条例所称抗属,以抗日军人之配偶并与抗日军人在一个家庭经济单位之直系亲属(父母子女及依其为生之祖父母与未成年之弟妹)为限”^{[13]247},全面保障军人和抗属权益。这一系列办法的细化,增强了动员的可操作性,化解了潜在矛盾,提升了群众的参与意愿与代耕实效。

三、代耕队的互助实践

陕甘宁边区的代耕工作,随着边区政府、代耕户、抗属等不同主体间互助关系的演进而不断深化。这些关系的互动丰富了代耕制度的内涵,使这项战时动员政策的社会整合功能愈发凸显。

(一)代耕户与抗属的互助关系演进

相关条例颁布实施后,代耕工作在边区普遍开展起来。代耕队初期的工作矛盾,主要体现在代耕质量上。1938年宁县工作报告指出,代耕中的不足显而易见,一是“没有彻底的严密的分工”;二是“代耕大都是有名无实的”;三是“抗属的耕种收获不能按时的做”^{[8]190}。部分抗属抱怨代耕户敷衍了事,存在“耕浅不耕深、种少不种多”的现象,引发代耕不如自耕的舆论。还出现群众更愿帮扶本地工属、对贫苦抗属关心不足的情况^{[11]69}。1940年7月15日,神府县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及,没有把优抗代耕工作放在第一位上抓紧领导^{[14]381}。有些群众不愿为

抗工属代耕,亦拒绝支付相应工资。并公开对抗工属表示,“你给我们吃了干饭,做的干饭工;吃了汤饭做的汤饭工”^{[14]383}。部分农民仍以个体生计为首要考量,对支援抗属的意义理解有限,未形成“万众一心抗战”的共识,在代耕中常存敷衍之心,致使部分抗工属无粮可食、土地荒芜。针对这些问题,边区各地加强教育沟通,代耕队员的思想逐渐从被动应付转为主动承担,甚至提供额外帮助。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工作报告称,工人在春季开荒运动中替抗属开了7500亩荒地,种早粮1000亩,延长县工人替抗属砍柴28250斤。曲子社工人代收麦95亩、锄地84亩。工人主动提出帮助抗日军人开荒,收集肥料给抗日家属种地,帮助挑水、砍柴^{[10]272}。1943年,安塞县为全县436户1153名抗属工属代耕,代耕土地31635亩,并为抗属“砍木柴70余万斤,足够烧半年以上”^[15],抗属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代耕户与抗属的关系逐渐从疏离走向理解和互助。在“公营事业,公共机关之雇用招收员生者,抗属得优先参加”^{[16]21}的政策感召下,抗属们也积极响应,纷纷投身边区女工行列,在纺织厂、印刷厂、抗属工业社等生产战线尽他们应尽的责任^{[10]484-485},彰显了互助的真正内涵。

(二) 边区政府与代耕户的互助策略调整

边区政府的代耕策略历经从强制分配到灵活调整的演进。代耕“是边区公民对于抗属一种义务劳动,故于实际劳动时,必须自带伙食,不得接收与要求抗属任何报酬”^{[13]55}。基层政权为完成任务,往往采取强制措施。神府县规定,代耕者如不能完成代耕任务,应负责赔偿^{[11]28}。安定南区部分乡1455亩抗属土地,只有425个农民代耕。平均每个农民要耕种3亩半,而每亩地需要9个人工和4个牛工才能耕好,有的还要自带耕牛和耕具^{[8]123-124}。这些做法虽在短期内保障了代耕,却埋下了干群关系紧张的隐患,其根源是农民劳动负担过重与对强制摊派的抵触,本质是行政命令与基层生产、群众利益的冲突。为此,边区政府积极调整政策,努力在减轻群众负担与保障代耕实效间寻求平衡。1941年2月,民政厅召开各县科长联席会议,专门讨论优属工作。3月发出优抗代耕指示,重申代耕应坚持抗属第一、工属第二,富者少代耕、贫者多代耕的原则,要按照本乡的劳动力情况代耕^{[13]83}。1943年1月17日,边区政府明令颁布《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规定在不荒芜土地且抗属与代耕者双方自愿的原则下,可采取包耕制,

或抗属将自有土地出租^{[13]250}。靖边县政府1940年5月份的工作报告提到,“对于抗干属之代耕,一般的是取消了过去之平均现象,在今年,有些最无办法之抗干属就给他多代耕一些(如镇靖一乡与镇罗区等)。对于抗属代耕除政府决定大人三亩、小娃两亩外,另外又向富有者每犍牛抽出牛工二、三个给抗属代耕”,“由此观之,这证明对于抗干属之代耕是转变了过去的平均现象,除个别的地方外,一般的能按期代耕”^{[14]319}。这些变通做法,促进了代耕工作开展,体现了边区政府在代耕工作中思路的转变。另外,边区还通过选拔与表扬代耕模范树立生产榜样,激发群众积极性。1940年10月,安塞县政府在工作报告中称,今年的代耕比往年较好,克服和纠正了一些不良现象。七区一乡有10余家抗属的地未耕种好,已换了50余亩,并教育了其他一般的代耕队员^{[14]468}。陇东曲子县劳动英雄孙万福,自1939年起担任本村代耕队长,每年为本村4家抗工属代耕50多亩地,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去年开荒400亩,增加粮食60石^[17]。互助策略的持续优化,既保障了抗战优抚的革命任务,又兼顾群众切身利益,推动代耕工作走向基于良性互动的生产协作。

(三) 边区政府与抗属的互助支持深化

陕甘宁边区对抗属的帮扶,逐步实现从物质支持到精神关怀、从直接援助到鼓励自立的转变。在组织机制上,边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抗属援助。除组建专门代耕队外,还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商人、自由职业者参与优抗工作。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与中国职工运动》中号召,在发动春耕中,要特别注意抗属和工作人员家属的工作,组织代耕队来保证他们的田地首先耕种好^{[10]234}。边区还呼吁机关工作人员尽可能抽出一些时间为抗属及十分缺乏劳动力的单身孤寡去代耕^{[8]238}。并组织成立了礼拜六工作队,要求机关、团体等组织协助近代耕队,开展慰问抗属等工作^{[13]113}。针对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提出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可以钱代工,通过代耕队进行交纳^{[13]116}。经过宣传引导,“有的工人替抗日军人家属背炭,木匠铁匠等给抗日军人家属做器皿不要工钱。在国历年节各区工人普遍的请抗属吃饭,并有些送米磨和送猪肉给抗属”^{[10]143}。在支持方式上,边区避免单纯救济式的帮扶,注重培养抗属的自主谋生能力。1943年3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为优待抗属组织代耕工作给各县的指示信》中强调,代耕工作应以帮助抗属自力更生为目标,防止其因长期

依赖优待而丧失劳动意愿。必要时可给以临时救济,有灾时也应给以急赈。但按期供给抗属粮食柴米,按期发给钱用,将把抗属养成不劳而食的寄生虫,这已失去优待的意义,对于抗属对于人民都是不利的^{[13]83}。因此,边区对抗属开展经常教育,使抗属明了自己光荣的地位,鼓励有劳动力的抗属主动耕地、纺织、喂羊、喂鸡,达到自力更生的地步。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强调,应注意“教育组织和帮助抗属积极参加生产,奖励生产中的模范抗属”^{[16]26}。提高抗属社会地位,并给予精神安慰,如群众大会时请抗属坐前排,每逢重要节日慰问抗属等^{[16]21}。随着边区对抗属的帮扶由生活保障发展为物质精神激励并重,边区政府与抗属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从单纯管理到互助关怀的深刻转变。

四、代耕队的主要成效

陕甘宁边区的代耕队通过为军烈属代耕土地,有效保障了其基本生活,稳定了后方生产,缓解了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鼓舞了军心士气。这不仅增进了社会各阶层团结,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激发了群众的参军拥军热情,强化了对边区政权的政治认同,为革命胜利奠定了民心基础与物质保障。

(一)保障后勤稳定

代耕制度的推广,在劳动力整合、土地利用及抗属经济自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勤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一,劳动力整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边区创造性地改良了传统的变工队模式,推动了劳动力的动员和调配。农民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农业生产任务,为农业丰收奠定了基础。1939年1月发布的《边区总工会一年来工作报告》记载,延安、安定农村工人替抗属代耕地885垧,又开荒地213垧,盐池工人给抗属代耕1055亩地^{[10]309}。1943年,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石,盈余21万石^{[1]213}。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的“耕三余一”的目标基本上得到了实现。第二,土地利用效率显著提升,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边区一级机关经营的农场,由1942年的8个扩大到1943年的13个。开垦了大量荒地,土地由2627垧增至3438垧^[18]。闲置土地被开垦,抗属土地得以妥善耕种,为粮食增产创造了条件,减少了因粮食短缺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第三,代耕直接保障了抗属的基本生活,帮助抗属实现了经济自立,减轻了政府

的财政负担。绥德新店乡的14户抗属通过代耕81垧土地,实现了自给自足,过上了“舒适生活”^[19]。延安市1940年5月的工作报告提到,在优抚工作方面,各区代耕工作已有初步的总结,东、南、北区共给抗工属种地160余垧^{[14]299}。延川县城六乡组织的15个代耕队,首先为抗属家庭耕地,赵家沟“代耕队给抗工属种的地,保证了抗工属今年能得到丰衣足食的生活,一年代耕队能供给二年的吃粮”^[20]。抗属生活得到保障,减少了其对边区政府财政救济的依赖,使有限的财力物力得以投入军事装备购置、部队训练等抗战核心事务,既优化了资源配置,缓解了财政困窘,更增强了边区经济的韧性。

(二)提振前线士气

抗属的生活状况直接关乎前线战士军心。号召群众做好代耕工作,“是边区人民一宗对抗战的巨大贡献,也是各级政府一项巨大的组织动员工作”^[21]。边区各地积极响应落实代耕制度,固林县代耕地达39963亩,神府县也有10028亩^{[8]123}。新宁县“三十三户退伍军人中,有五户地由群众给全包耕,两户代耕,八户辅助代耕”。一年内,“大部分做到了吃穿用都能供给,还有三户做到了耕一余二,两人已有了老婆,有的已把家搬来”^[22]。代耕不仅保障了抗属生活,更凝聚了群众支持抗战的力量。战士王万楨探亲时目睹家人因代耕而衣食无忧,深受感动,立誓“我只有好好干”^[23]。后方的切实保障,让战士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战斗,极大地稳定了军心。据《解放日报》报道,延川、清涧两县近4万垧土地上,有17258名代耕队员辛勤劳作^[24]。抗属亦通过家书将后方境况告知前线,鼓励他们积极抗日。模范抗属代表吴满有致信前线子弟“望你自己努力抗战,抓紧学习,使劲生产”^[25],安塞的李兰英嘱咐丈夫“安心闹革命”^[26]。这些饱含深情与期望的家书,跨越战场与后方的距离,给予战士强大的精神鼓舞。战士们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与理解,更加坚定了抗战决心,强化了战斗意志。

(三)巩固统一战线

代耕工作秉持“抗日高于一切”的理念,超越党派界限,形成了全民支援前线的局面,增强了统一战线的凝聚力。首先,对国共抗属同等待遇彰显了民族大义。1942年6月6日,边区政府下发的《关于优待代耕工作的指示信》明确指出:“对于友军抗日军人家属住在边区者,应给以和八路军家属同等优待和代耕。”^[27]固林县代耕工作中,将国民党军属纳入保障范围,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中求同存异、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坚定决心。这种不分党派、一视同仁的优待政策,打破了党派隔阂,向社会各界传递了团结抗战的强烈信号,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促进了国共合作。其次,代耕工作吸引边区各阶层民众积极参与,形成了全民抗战的生动局面。商人虽然不直接参与田间劳作,但通过“以钱代工”为代耕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妇女儿童则组成杂务队,承担起为抗属担水砍柴等日常事务^[13]¹¹³。这种全民参与的模式,激发了社会各阶层的抗日热情,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基更加稳固,汇聚起强大的抗战合力。

(四) 引发参军热潮

代耕制度的广泛推行,推动了“当兵光荣”这一观念在边区社会的形成,并使其日益深入人心。民众亲眼看见子弟兵在前方为国奉献,其家庭在后方得到了切实保障,参军积极性大幅提升。“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广大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民不但积极为前线出粮草、钱财和出勤,而且踊跃参军参战,这就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28]²⁰¹全边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参军参战的热潮,出现了父子、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送夫参军的动人景象^[28]⁴²⁶。1939年12月10日,陈云在题为《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的报告中谈到:“组织代耕队帮助抗日军人家属,这是关系巩固部队的重要事情,不要看轻了。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扩大军队就困难,甚至会影响军队的巩固。”^[10]³⁷¹⁻³⁷²只有切实解决好抗属的实际问题,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越来越高。1941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三年来边区子弟曾不断向队伍涌进,“去年春季动员,原计划扩大部队三千五百名,结果竟动员了五千多人”^[29]。民众踊跃投身军旅,为抗战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形成军民一心、共御外敌的良好局面。

(五) 强化政治认同

全民族抗战时期的代耕队,表面上是战时劳动力互助的生产举措,实则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入基层的政治实践,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与价值追求。它不仅有效缓解了抗属生产困难,更在运行中实现了政治认同的建构与强化。边区以代耕工作切实保障军烈属生活,生动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彼时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存在抓壮丁、漠视军属的问题,军人出征后,家属常因缺乏劳动力陷入贫困,甚至遭受地主、劣绅的盘剥,国民党政府却缺乏有效的救济举措。而陕甘

宁边区政府通过组建代耕队,筑牢抗属生活保障线,将拥军优属政策落到了实处,这种务实为民的作风,成为赢得民心、巩固政权的坚实政治基础。同时,代耕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凝聚抗战共识的重要渠道。边区大力倡导拥军优属理念,为代耕工作赋予鲜明的政治意义,通过《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刊,将代耕界定为巩固抗战后方的光荣任务,同时借助标语、戏剧、民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化这一观念,把群众的个体劳动与国家民族的抗战命运紧密联结。此外,边区还将代耕纳入大生产运动体系,通过评选劳动英雄、开展道德表彰等方式,让代耕从单纯的经济互助,逐步成为评判群众政治觉悟的重要依据。1943年兴起的吴满有运动,便将积极参与代耕的劳动模范树立为学习榜样,引导民众从被动履行代耕义务转向自觉参与,让个体劳动被赋予集体意识与革命忠诚的丰富内涵,持续加深了广大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可见,陕甘宁边区的代耕队,不仅是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应急之举,更是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工作与政治动员深度融合,在群众中塑造认同、汇聚力量的长远之策,亦为理解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提供了样本。

结 语

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创立的代耕队,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展社会动员、保障民生福祉、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实践。这一举措通过制度化、组织化的社会互助,有效纾解了战时劳动力短缺困境,切实保障了抗属生活,稳定了军心民心,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与群众基础。尽管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分担不均、代耕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但边区政府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持续调适与完善代耕制度,确保了政策实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所迸发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也为其历史价值与学理研究提供了丰富样本。代耕队的历史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国国民党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补充了战时微观社会互助制度的研究,更清晰呈现了民间互助向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协同推进的历史路径,拓展了近代中国战时社会治理与建设研究的理论边界。

注释

①黄华文、王一丁:《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拥军工作的述评》,

《军事历史》2002年第1期;李翔:《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代耕问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宿志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代耕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魏彩苹:《民生视角下的陕甘宁边区抗属优待救济》,《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张雪梅:《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抗工属优抚问题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②参见莫文骅:《生产运动中的政治工作——给八路军留守兵团一九四一年的政治工作之建议》,《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1月15日出版,第3卷第1期。

参考文献

[1]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2]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1.
[3]石毅.什么是“变工”和“札工”[N].解放日报,1943-01-23(4).
[4]把劳动力组织起来[N].解放日报,1943-01-25(1).
[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农业[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441.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29.
[7]唐新民.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7.
[8]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
[10]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8.
[11]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186.
[13]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1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2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15]安塞群众积极优抗,代耕土地保障吃粮不缺[N].解放日报,1943-09-28(2).
[16]李敏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17]赵元明.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M].大连:大众书店,1946:40-41.
[18]星光,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321.
[19]绥德一万四千抗属是怎样生活的?[N].解放日报,1942-03-02(4).
[20]延川赵家沟代耕队先给抗工属秋收,一年代耕能供两年食用[N].解放日报,1943-10-22(2).
[21]《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14.
[22]新宁召集退伍军人座谈,了解建立家务经过,检查他们和干部群众的关系,帮助他们订生产计划[N].解放日报,1945-05-12(2).
[23]傅长清.庆阳三里圪塔刘乡长等优待抗属很周到[N].解放日报,1945-02-03(2).
[24]延川清涧人民优待抗属,代耕土地四万垧,友军家属同等待遇[N].解放日报,1942-07-20(2).
[25]吴满有.吴满有捐款劳军,积极领导优抗工作[N].解放日报,1943-01-26(2).
[26]高建中.李承统乡长积极帮助下,安塞抗属李兰英有牛有驴衣食丰足[N].解放日报,1944-10-26(2).
[27]宿志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代耕问题研究[J].史学月刊,2007(9):64-71.
[28]房成祥,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9]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261.

The Mobiliz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of the Substitute Farming Teams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eng Bing Ge Yujie

Abstract: During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substitute farming team system established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was an important measure adop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drew on the traditional folk labor-exchange practice, responded to wartime needs, and consolidated the united front.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ized and standardized substitute farming by issuing relevant regulations, setting up specialized organizations, and refining specific working methods, thus realizing effective mobilization of social forces. Its practice reflected the evolution and deepening of mutual assistance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farming households providing substitute labor, and families of anti-Japanese soldiers. The operation of substitute farming teams guaranteed the livelihood of soldiers' families, boosted the morale of frontline troops, consolidated the united front, stimulated an upsurge in joining the army, and strengthened the public'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rty. Growing through extensive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turing in in-depth mutual assistance practices, substitute farming teams eventually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Key words: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substitute farming teams; social mobilization

责任编辑:长亭